

崇祯本可不上吊：是谁把他逼上煤山

崇祯之前的三个皇帝简直匪夷所思，绝对是皇帝中的奇葩：神宗 30 不上班，好几茬高干到退休都没见过领导；光宗是个花痴，上台不到一个月，直接牺牲在床上；熹宗的木工和瓦工手艺绝对一流，本职工作统统交给魏忠贤代劳。

崇祯帝却一反常态，是个勤政廉政的模范，工作 17 年，病假都没请过；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，为减轻财政负担，让老婆做饭织布。

这样一个不错的皇帝，却于甲申年(公元 1644 年)三月十八日深夜，在离紫禁城一箭之遥的煤山(今景山)悬树自尽，在遗书中要求李自成不得伤害广大群众。

一个王朝的灭亡自有其必然性，山都挡不住，但历史不是一条直线。老天爷曾经给过崇祯两次机会，哪怕抓住一次，他就可能不用上吊，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，甚至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。但是，僵化的大脑、无休止的会议和一个又一个文件，还是把他和他的国家逼上了煤山。

南迁计划如何泡汤

第一次机会。甲申年正月，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，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，形势瞬息万变。大年初三，崇祯叫来太子办公室的李明睿开小会，研究应急方案。

李明睿的意见是南迁，他认为，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，就能缓过气来。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，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庶的南宋，赵家天下又延续了 150 多年。咱大明的条件比那时候强多了，地方比它大，物产比它丰富，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，设南京为陪都，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。

李明睿敦促，只要您下决心南下，东山

或可再起，大明中兴有望。沿途的河北、山东、江苏的情况目前还不错，安全不是问题。总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，尽快动身为好。

李明睿说得有根有据，崇祯听得入神，两人深谈了一昼夜。

不过，按明王朝的制度，皇帝的重大决策需要得到政府部门支持；而且崇祯还担心，如果自己出头提出放弃首都和祖陵，身后一定挨骂。最好由政府部长们在会上先提，自己假装不同意，部长一再劝迁，这样的决策过程最完美。

会上，崇祯帝流着泪试探说：“形势都这样了，我想亲自上前线，战死疆场，你们都别拉着我。”各部部长争着要为领导分忧，代皇帝出征，就是没人提南迁。

李自成大军越打越近。崇祯暗示李明睿写一份报告，把南迁议题公开化，试图倒逼政府。政府首席部长陈演反对南迁，故意把消息捅出去，弄得沸沸扬扬，谣言四起，人心大乱。他还嫌不够，指使一个小干部向上递材料，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，是“邪说”，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。

政府坚决反对南迁并非偶然：

一是意识形态上的。士大夫阶层长期被正统教育洗脑，坚信撤退可耻，在政治上是错误的；

二是为了保命和推卸责任。南迁成功还好，万一失败，出主意的、附议的，肯定没有好下场；

三是实际利益上的。美宅良田不可能带走，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。最要害的问题在于，南迁之后，南北两个政府一合并，肯定要裁员，官员们思量的是：俺的位子还有没有、好不好？

这样，大家都觉得等等看看最保险，不愿轻易下赌注。

甲申众。

面对本轮大乱，朱由检不想独自担负抛弃社稷宗庙罪名。但，谁会上当？谁能摸清这位 17 岁就灭了权奸魏忠贤的英主啊！一个对答不合，可能就掉了脑袋。

满朝文武乃至皇上都不敢与后金公开议和，我们看到宋金耻辱的记忆印刻在东林党人心中，秦桧的叛与岳飞的忠，使得晚明士人、时风认定谈判即投降。即使，后金与金国大大不同，明帝国与后金谈判只能是暂时休战，完全不^是宋时称臣纳贡。但，社会舆论就是不^干。

高蹈于晚明的士风，我们可以在方孝孺身上看到基因。为了他一个人的名节，他在朱棣“不写即灭九族”的试探威胁中，赌气“灭我十族又何妨”，真的把 873 人陷进去了；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，保卢斯元帅率 20 余万德军投降，损失的是名节，保留的是 20 万将士生命。

名节很重要，所以帝国旌表了很多节烈妇；所以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只能坐在城中等待援军。

想到了谁

3 月 19 日凌晨，面对着北京外城的火光及内城城门的失守，崇祯去冠冕以发覆面，悬挂于煤山歪脖子树下，一只脚光着。皇帝留下遗书：“然皆诸臣之误朕也…百姓不可杀，百官不可留。”崇祯在位期间杀过两位首辅，换过三十一位正部长及五十位大学士(包括流放、处死、下令自尽)，杀督师总督 11 人，杀巡抚 11 人；留给李自成的遗嘱仍然是杀光百官。

一个有意思的心理问题，崇祯帝死前想到了谁？我想，崇祯皇帝也许会想起三个人：袁崇焕、朱由校、魏忠贤，皇帝的命运或许从他们仨中间能够找到答案。

广东猛人袁崇焕在崇祯刚即位，平台召见时就打了包票，“五年建部（建州女真）可平”。崇祯大喜过望，但袁崇焕出来后，同僚一问大惊失色，“你牛逼吹太大了”。袁有点忐忑，但强作镇定：“他刚上台，我是宽慰下他，给他一个定心丸。”同僚摇头：“今上英明，可不是能糊弄的人。”

果然，三年之后，星夜驰援勤王的袁督师被寸磔于京城，肉被刽子手一块块卖给北

李明睿非常气愤，又加以回击。支持和反对的都撕破了脸，一时间材料纷飞，会议不断，轰轰烈烈，就是没有结果。

崇祯皇帝急得不行，有一次开会前，他甚至把话说白了：“老陈，这事儿请您替我担待着点儿！”但是陈演在会上一直笑而不言，崇祯几次逼他发言，他都是笑笑而已，气得崇祯一脚踢翻了椅子。

这样一折腾，一个多月就过去了，形势更加凶险。在二月二十七日的会上，崇祯呼吁大家敞开说，说错了不要紧。他寻思，哪怕两派势均力敌，他也好拍板。但结果依旧。紧接着，李自成大军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，北京危殆。

崇祯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果断跟李明睿等人摊牌：“不管他们了，这事我说了算，咱们立刻南迁！”李明睿叹口气：“来不及了，沿途我军都被打散了，北京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。”

明朝为何不受李自成的大礼

第二次机会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事情到了这步田地，大明王朝居然还有一口气。

李自成本是个在政府招待所出苦力的粗人，并不具备政治家的博大胸襟，所以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，也不太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。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复兴门一带了，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，要求和谈，并且要价不高：割让西北一带给他，西北实行高度自治，不向中央报告工作；中央拨付 100 万银两慰问金给他，他替政府打击敌对势力，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满人集团。

傻子都知道这桩买卖不赖，况且别无选择，但大家都不表态。如果说南迁问题还可

京老百姓，当场生吃，血流齿颊。

以我看，崇祯绝非中了反间计，他是逮捕袁 8 个月之后才予处决，宣判罪名是“谋叛欺君，结奸蠹国。轩帅以践虏约，市米以资盗粮。既用束首，阳导人犯，复散援师，明拟长驱，及戎马在效，顿兵观望，暗藏夷使，坚请入城，意欲何为？致庙社震惊，生灵涂炭，神人共忿，重辟何辞！”

所谓叛国只在第一句谋叛浅淡带过，而落笔在于结奸蠹国，如何结奸，不知道，下面就是追擅自斩杀毛文龙的旧账，私自与敌人交易物资。

擅杀毛文龙，崇祯当时并未追究，且表扬了袁，但是埋下了怀疑的伏笔：袁崇焕的权力是不能斩杀和他同一级别的大军区司令员的，而且杀了毛文龙之后，耿精忠、尚可喜就叛逃到了后金。

然后注意，亮点出来了：导引后金兵入寇，不去攻击却在观望，你的部队一直要求入城，是神马意思？致使我受惊非浅，狗不如的东西，不判你重罪谁都不能答应！

通篇仍然没有一字坐实袁的反叛，远非清代乾隆公布秘档，是因为反间计奏效。

一份基本上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判决书，就把袁督师给杀了，还是千刀万剐。

300 多年后，翻开历史尘封档案，我看到了运作这篇判决书的两个人，一个叫作温体仁，浙江吴兴人，毛文龙的同乡，立志要为毛报仇，时任内阁总理(首辅)；一个叫作梁廷栋，国防部长(兵部尚书)，与袁是同学(同年)，但袁做过他的上司，得罪过他。

19 岁，崇祯的多疑性格已经定格。8 个月，足够他明白袁不可能是叛徒，但袁非死不可。袁太不让他放心了，放出来怎么办？

以此性格，临死时，崇祯也一定不会认为他杀错了袁崇焕。

崇祯临死前想到的第二个人，应该是他的哥哥朱由校，天启皇帝。也正因为哥哥没有子嗣，朱由校才意外地从信王登上皇帝宝座。上位伊始，17 岁的少年就以雷霆万钧之力，就将权倾一时的九千岁魏忠贤发配守陵，并赐自尽，尸体寸磔。

但，最荒的是，在大顺军攻破北京城前夕，崇祯突然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。17 岁刚即位就亲手灭了魏忠贤阉党的崇祯，从此自视英主；34 岁自缢前夕密令收葬魏氏，可真是意味深长。

以拿出来说说，那么割地赔款这顶政治帽子太大了，没人敢碰。

但是不发言也不对，于是部长们一个接一个慷慨陈词，愤怒谴责敌人的狼子野心，决心血战到底，与北京共存亡。李自成凭空送的大礼，根本不在明王朝最后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的议题之内。

崇祯本想乘着夜色混出城去逃命，但是从安定门、朝阳门到前门，没有一个门为他打开。眼看天要亮了，只好孤独地走向了煤山……

他死后仅三个小时，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。那些政治坚定、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？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，排队请求安排工作。

景山公园那块石碑上刻的是“明思宗殉国处”，“思宗”是崇祯的庙号。的确，崇祯和明朝的悲剧留给后世沉重的思考。

崇祯君臣的议事秀，空留千古憾事

崇祯皇帝死后不久，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，说得非常到位，也好像在替敌人难过：

你们明朝的干部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，就喜欢唱高调、讲大话，哪怕火烧眉毛了，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，作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。当年北宋研究对策还没散会，金军就渡过黄河了，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？！

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，一步得生，一步得死，岂容贻误。僵化的思想、狭隘的私利，导演了崇祯皇帝君臣极不负责任的议事秀，空留千古憾事。可见，改进文风会风，清扫作风背后的垃圾，关系事业成败、国家兴衰，是极其严肃的政治课题，绝非枝节小事。（摘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，作者：习骥）

崇祯的最后 48 小时：他为什么不逃？

265 年的崇祯年号

吴思说过“崇祯死弯”，指崇祯一朝为了镇压变民军，到处搜刮军饷，结果仗打得越多，变民越多，这是帝国灭亡根源。我不这么看。

朱家恰恰倒在了太祖皇帝设立的政治体制上。

让你傻眼的是，朱元璋立国之初就搞过三权分立！帝国分设都指挥使司(地方军事)，承宣布政使司(省级行政)，提刑按察使司(司法监察)，差点就变成“三权分立是中国创造的”。

可为何后来全不是那么回事？本质上：家天下的体系产生不了现代共和制的监督体系。

朱家的体系，是“层级干掉制”。比如，巡抚这个官职，原是明代各部副部长或御史挂职巡抚巡察各地，类似中央巡视组组长，到后来挂职巡抚的却变成了常设的省一级长官。巡抚与布政使相互制衡，厂卫们又能够任性地逮捕任何一位封疆大吏。

朱元璋设计的最大特点(缺陷)，最顶层必须有个终结者。但，不是谁都能做朱元璋的，他的后代反而不断造就“九千岁”的神话，刘瑾严嵩魏忠贤都是；其二，作为国家行政体制总设计师，朱元璋只考虑了单向度：即奴才一定会感激涕零地接受皇帝的信任，没想过奴才不会不识抬举。

大明亡国便亡在这条单向车道上。1644 年 3 月 18 日，帝国运行的最后一天，朱由检亲自击鼓，召集百官上朝，没有一个人来，多疑、嗜杀、任性的老板，最后被员工抛弃了。

1644 年 3 月 19 日凌晨，崇祯自尽，再次回到了 276 年前朱元璋立国的原点。信任与不识抬举，这套私人情感用词，始终与明代国事相伴，并被崇祯作为帝国最后的陈词：“然皆诸臣之误朕也……”

亡国之君让人目瞪口呆，对泛东北亚近现代史影响最长的正是崇祯皇帝。所有皇帝年号使用最长的是“崇祯”，崇祯死后，他的年号依然在朝鲜李朝沿用，中朝前后一共使用了 265 年！当年的朝鲜，即便归入满清的藩属也不认夷狄为正统，李朝心怀中华，在本国一直用崇祯年号；就连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时，舆论也一直宣传他是崇祯皇帝转世。

（摘自《大家》，作者：李天军）